

# 南宋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观及其现代价值

叶 晗

(浙江科技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杭州 310023)

**摘 要:** 发轫于宋室南迁,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民族危机深重之时的浙东学派,以解决社会问题、振兴经济为出发点,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主张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社会和谐发展观。这一社会和谐发展观既有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基础,又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巨大超越,具有立足于经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其形成有着与南宋商业经济形成同步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价值;其先进性正是浙江文化传统现代价值的核心之所在。

**关键词:** 南宋;浙东学派;和谐发展;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C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10)03-0207-05

##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of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modern value

YE Ha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Since Song Dynasty's capital moved to the south, the center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moved, too. At this national critical moment, for settling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revitalizing the economy,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stak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 propositions which formed a systematic view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is view based on and went beyond 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ious ideas, had a scientific connotation which had a foothold on the whol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The formation of the view which in step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y for busines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refore it has an important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its progress is the core of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Key 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modern value

**收稿日期:** 2009-11-05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05N121)

**作者简介:** 叶 晗(1967—),女,浙江义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浙江区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浙江自南宋以来,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名人辈出。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跻身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浙江现象”“浙江精神”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海内外对构筑浙江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的浙东学派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无论是关于浙东学派总体思想发展脉络的研究,还是对于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及它们的代表性人物叶适、陈亮、吕祖谦的具体研究,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浙东学派学术与事功统一,“义利并存”等的思想已经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

但是,仅仅从某一单个层面上认识南宋浙东学派思想的重大价值并不足以体现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也不足以全面解释以浙东思想为重要积淀的浙江文化精神何以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发轫于宋室南迁,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民族危机深重之时的浙东学派,以解决社会问题、振兴经济为出发点,提出的“天理与人欲并存”“以义和利”“义利双行”“农商相藉”“实政与实德双修”“经世致用”等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主张,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社会和谐发展观。这一社会和谐发展观既有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基础,又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一次巨大超越。

## 1 南宋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观的思想基础与体系建构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基本上是围绕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人际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天人合一”和“中庸”“中和”这两个命题来展开的。

关于“天人合一”,许多学者已经就老子、庄子、孟子、董仲舒、张载、程颐、程颢、王阳明等思想家的“天人合一”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很多研究者认为,作为中国文化精神主导方面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例如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的协调问题。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得到自然界与人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的统一,以及由于这些统一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sup>[1]</sup>。邵汉明先生认为:儒家承认、肯定天和、自然界和人类精神具有统一性,并把这种统一、和谐视为人类的最高理想<sup>[2]</sup>。也有研究者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凸现的是实践理性精神。实践理性重在做人 and 如何做人,关注成就理想人格即圣人的可能和根据,解决的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sup>[3]</sup>。

关于“中庸”“中和”的研究。很多研究者认为贵和尚中、中庸适度是儒家重要的思维方式。“和为贵”“致中和”等思想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及美学的内涵。在传统文化看来,个人的修身养性、立德如果通过执两用中达到了中庸,就是实现了道德的最高标准<sup>[4]</sup>。以此就可以实现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大同、万邦协和的理想。

可见,中国古代和谐思想较多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于人与社会及社会自身关系和谐性的关注则十分不足。究其原因,既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形态发展的不成熟,也有中国自古以来学术过于关注意识形态的理念之争,缺乏对现实社会参与精神的陋习。而叶适、陈亮、吕祖谦等南宋浙东学派代表性人物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则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一次巨大超越。其关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诸多方面的主张已经构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社会和谐发展观。

### 1.1 关于社会和谐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对朱熹、陆九渊等人争论不休的“无极”“太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极”是指某物自身所包含的各个因素都处于内在和谐的状态。“极”取决于具体事物及其关系的存在,而不是与物相对的单独存在。作为室和车的概念离不开构成室和车的具体器物。道必须在具体的器物中才能表现自己。叶适认为天地万物皆两,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最终归结于均衡或调和。“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sup>[5]732</sup>。叶适以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把调和矛盾的中庸之道提高到了事物的最高原则。

南宋金华学派的代表吕祖谦则把宇宙万物视为一种切己而非异己的存在,进一步发挥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消除了“吾心”于宇宙天地、万事万物的一切隔阂和分界,将是否实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

体,浑然无间作为衡量“仁”的标准。吕祖谦为学素有“博杂”的特点,“不主一门”“不私一说”,而是“兼总众说,巨细不遗”<sup>[6]</sup>,将理学、永嘉、永康学派的思想糅合为一,求同存异。

### 1.2 关于理与欲、义与利关系的和谐

宋代道学兴起之后,“理”与“欲”,“义”与“利”的对立十分突出。道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

南宋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则明确提出“义利双行”,天理与人欲并存的观点。“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sup>[7]82</sup>。陈亮强调了道德不能仅仅作为内在修养必须同时体现于行为活动之中。道在事中,也即义在利中。义与利不能非此即彼,扬次抑彼。道德的实际指向应该是天下之公利,是社会现存状态得到普遍改善,民生利益得到普遍增进,因此,道德是人类自身为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而加以利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道德也有功利意识。

叶适批评了道学家“以义抑利”之说,主张“以义和利”,认为仁义与功利是统一的,“谋利而不自私其利,计功而不自居其功”便是仁义。“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提出“实政与实德双修”的主张<sup>[5]6</sup>,认为道德要以百姓的利益为核心,落实到“民利”上。叶适认为财政是国家头等大事,善于理财才是圣君贤臣。

### 1.3 关于农业、商业关系的和谐

陈亮提出“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的同时又明确提出“农商相藉”的观点,认为农业和商业都是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农商之间不是彼此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的互助互利、互为促进的和谐关系。“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sup>[8]127</sup>。强调了只有农商并重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才是天下大治的和谐境界。

叶适反对政府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批评“抑末厚本”的思想,希望政府能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削减妨碍工商业发展的苛捐杂税,对工商业者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天下速得生养之利”<sup>[5]657</sup>。

### 1.4 关于道德与法制关系的和谐

陈亮对孔孟以来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做了发展。陈亮认为:“礼乐行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为之师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则人心有正而无邪,民命有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由以分也”<sup>[7]92</sup>。将讲求仁义孝悌的德治与讲求礼乐刑政的法制相结合的理想境界就是王道的实现。通过法的调和,公私可以合一。“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sup>[7]98</sup>。“天运之公,人心之私,苟有相值,公私合一”<sup>[7]349</sup>。陈亮针对社会、“事功”的需要,强调法因时而变,“天下不可以无法也,法必待人而后行者也”<sup>[7]100</sup>,是对儒法两家法制思想的谐合和发展。

### 1.5 关于学术与事功关系的和谐

南宋浙东学派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为了富国强兵、挽救社会危机,提倡学问要与事功结合。陈亮痛斥理学家空谈“道德性命”“实事与议论两不相侔”,学术与事功判若两途的积弊,认为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统一,学术必须服务于国计民生。批评“不知事功为何物”“不知形势为何用”者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sup>[8]8</sup>。叶适强调“务实而不务虚”<sup>[5]617</sup>。

## 2 南宋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观的生成机制

一种文化的繁荣是诸多因素合力产生的结果。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思想的形成有着南宋浙江已经居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代表社会进步因素的商业经济十分繁荣,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形态开始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 2.1 政治因素

宋皇室南迁,宋王朝仅存半壁江山,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其中民族矛盾则是主要矛盾。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使得其统治大厦时有倾覆之危险。江南人民由于负担急剧加重,生活日益艰难,对宋王朝统治的不满也日益加剧,爆发了大小不等的多次农民起义。

面对严峻的现实,以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朱熹等道学家虽

也主张抗战反对求和,但并没有直接面对现实,只停留在空谈义理的基础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叶适等与程朱道学彻底决裂,反对空谈义理,积极认真地去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而独树一帜,另立一派,这其中政治上的原因是直接且显而易见的。

## 2.2 经济因素

南宋浙东学派关于经济、社会的诸多思想就其发展过程来看,毫无疑问是在当时浙江尤其是温州等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以永嘉学派的发源地温州为例。温州位于浙江最南部,境内绝大部分是山区,历来是浙江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到南宋时,温州就已形成人多田少的局面。由于田地太少,不能仅仅依靠农业,还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工商业。于是,这里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温州在北宋时已是东南地区较为重要的工商贸易城市。宋皇室南迁后,温州更是空前繁荣,以“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而闻名。

温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事功学派在温州,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也就成为极自然的事。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主的出现,自然会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新的需求,永嘉学派代表的就是这些新兴阶层的利益,其思想主要代表了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和需求,产生了讲求实功、发展商业、保护商人等实学思想。

## 2.3 文化因素

南北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南北文化的表现形态与地位势力不尽相同,但是二者之间的影响从未间断。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北方占据着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这种状态一直到东晋时期才得以改变。隋唐时期,南北文化大抵呈均势之态。

公元1126—1127年“靖康之难”及其引发的宋皇室南迁,使五代以来数百年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地位得以形成。这一形势的重要影响便是给浙江文化的繁荣昌盛起到了催化作用。中国著名的文化史专家王会昌认为:“宋室南迁标志着中国文化‘江浙时代’的开始。在此后的七、八百年间,从长江三角洲到杭州湾沿岸,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才迭出,群英荟萃,被誉为‘人文渊蔽’”<sup>[9]</sup>。

在南宋文化中浙东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浙东可以说是南宋思想、文化的重心之所在,是人才的聚集之处。《宋元学案》中,南宋浙东的学者有500人,浙西才72人。南宋浙江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坐落在浙东。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就是代表。更重要的是,南宋浙籍的8位有全国影响的思想家薛季宣、吕祖谦、唐仲友、陈亮、陈傅良、叶适、杨简和黄震,无一不在浙东。由此,形成南宋浙学的四大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和四明学派。

## 3 南宋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观的现代价值

南宋是浙江文化传统的成型期。浙江文化不仅是南宋文化的代表,也深刻地左右了此后中国文化的走向。浙江务实、重商的传统在浙东。历史已经证明,汇聚南宋思想文化精华、得风气之先的南宋浙东学派的社会和谐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对南宋以后浙江及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进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3.1 顺应社会转型的变革创新精神是其现代价值的灵魂

“概言之,儒家的和谐思想,是整体和谐、群体和谐与道德和谐的辩证和谐观,是以承认‘不同’为前提而以‘太和’为最高境界的多元和谐观。而儒家多元和谐观的基本价值观,则是以仁、和为核心,以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为主要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体系”<sup>[10]</sup>。

在继承、批判传统道德人文主义和谐观基础上所形成的南宋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观,是南宋国土沦丧、国势衰弱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体现的是当时南宋文化中变革、创新的新声。由于其在生成机制上有着与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其商业经济形成同步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重要的立足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正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强烈的社会变革精神,构成了南宋、明清一

直至今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及精神资源,浙江才能够居于全国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前列。

### 3.2 基于目的或价值合理的功利行动是其现代价值的核心

“儒学的现代化就是要从讲求德性到讲求德性与理性,从讲求动机到讲求动机与后果,从直觉的善走向理智的善,从直接的现实的善走向与间接的理想的善的统一。……陈亮与叶适所代表的是儒家思想从德性论向功利理性论或实用理性论的转化,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方能开花结果”<sup>[11]</sup>。根据韦伯的现代化理论,有别于情感性或传统性行动的目的合理的行动和价值合理的行动是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行动。“以义和利”“农商相藉”是浙东学派社会和谐观的基本理念。重视事功,以关切现实政治事务的实现,达成国家的富强发展,促进民生利益的普遍增长为价值取向,强调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显然是与现代商品经济中重实利、讲功效的社会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行动。可以说,无论是对于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儒学传统的革新,还是对于不切实际的理学的批判,法制精神与公平思想及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的政治思想的提出,都为后期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发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切合商品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推进社会改革与发展意义的理念经过明清浙东学术的繁盛,已经成为浙江人的文化自觉和精神特质,是浙江文化与精神的核心,也是其现代价值的核心之所在。

### 3.3 坚持学以致用学术品格是其现代价值的源泉

南宋浙东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和婺学,这三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有着基本一致的学术研究风格,表现出相互接近的关于学术的基本价值理念,表达了关切社会现实事物的共同的学术精神。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关于道德性命的追寻,若仅仅停留于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层面,乃是严重不足的,而必须将它充分贯彻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从社会历史的自身演进之中才能充分还原出道德性命的真正内涵”<sup>[12]</sup>。无论是吕祖谦明确提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教育宗旨,还是陈亮大力反对程、朱空谈义理,或是叶适强调“务实而不务虚”,南宋浙东学派开创的以“经世致用”为终极学术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态度后经明清黄宗羲、万斯同等浙东学者的发扬,已成为浙江文化学术界的主导思想和治学原则,对浙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4 结 语

南宋浙东学派社会和谐发展观在理论上弥补了自古以来和谐思想中对于人与社会关系及社会自身关系层面和谐性重视的不足,使一直以来停留在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上的和谐思想至此开始走下神坛,有了立足于经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发展的科学内涵。其颇具现代价值的思想内蕴已经对浙江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成为浙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89.
- [2] 邵汉明.儒道人生哲学[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270.
- [3] 高晨阳.论“天人合一”观的基本意蕴及价值——兼评两种对立的学术观点[J].哲学研究,1995(6):22-26.
- [4] 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27.
- [5] 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6] 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7] 陈亮.陈亮集增订本[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8] 陈亮.陈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 王会昌.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与东南沿海的机遇[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1):52-54.
- [10] 吴光.中华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M]//滕复,徐宇宇.弘扬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6.
- [11] 成中英.义利之辨与儒家中的功利主义[M]//卢敦基,陈承革.陈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6-27.
- [12] 董平.陈亮的哲学与事功学[M]//卢敦基,陈承革.陈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8.